

陈炎 著

反理性思潮的反思

山东大学出版社

现代国外社会科学译丛

反理性思潮的反思

——现代西方哲学美学述评

陈 炎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现代西方哲学美学述评/陈炎著. 2
版.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7
ISBN 7-5607-1310-6

I. 反…

II. 陈…

III. ①哲学学派-研究-西方国家-现代②美学-流派-研究-西
方国家-现代

IV. ①B089②B83-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5822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 印张 234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2 版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2000 册

定价：16.8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启蒙:思维方式的革命

本书展现了二十年来研究中国启蒙运动的我的主要心得。

中国启蒙运动,从维新变法运动算起,迄今已经超过百年。这一运动以用现代文明取代古代文明为自己最高的使命。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出版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说:“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环绕着陈独秀所说的这三件大事而展开的。生物进化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民族与国家生存斗争学说、阶级斗争与革命学说,人权论及民主与专政学说,社会主义学说,这些学说的传播,在中国导演了或波澜壮阔、威武雄壮,或光怪陆离、惊心动魄的一出又一出活剧。直到20世纪最后这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日子里,启蒙方才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总的主题。

本书正是基于中国启蒙运动发展的这一实际,以第一章对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及启蒙运动发展的总趋势作了概括的综合论述,以下即用四章的篇幅,分别考察了环绕着进化与革命、人权与国权、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四件大事启蒙运动渐次展开的具体情况。进化与人权的顺序和陈独秀所列的次序调换了一下,这不仅因为进化论的传入和它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比人权论要早,而且因为它的实际作用似乎比人权论要更为强烈更为深刻。

本书题名为《理性缺位的启蒙》,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反思整个中国启蒙运动时,要将“理性缺位”这一特征特别强调出来?

这可以说是经二十年来反复考察思索所得出来的一个相当痛苦的结论。在回顾一百年来中国启蒙运动发展的全部历程时,发现它之所以有那么多曲折,那么多的问题,除去社会转型、社会运动本身的制约外,就这一运动自身而言,不能不承认它有着过于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集中到一点:它太急于求成了,因此太注重于用一个又一个现成的学说来对民众进行灌输,而忽视了功效似乎比较迂回的包含启蒙思想家在内的整个民族思维方式自身的革命。它始终没有对以理性思维取代占支配地位的传统思维方式给予起码的重视,更不用说给予足够的重视了。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将启蒙定义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他给启蒙拟定的座右铭就是“敢于认识!坚信自己的理性”。关于理性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曾经有过非常精彩的明确论述: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

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中国启蒙运动显然未曾建立起这样的理性法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启蒙思想家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启蒙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一场历史性的革命。他们更多重视的是西方启蒙运动给现代文明提供的进化论、人权论、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卓有成效的具体成果。理性反而被更多地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联系在一起。当中国启蒙运动开始时,西方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冲突已经突现出来。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同样为人熟知的另一段论述所说: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中国启蒙思想家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并形成尖锐对立的态势时,便将对于理性的重视及追求连带着一同舍弃了。

但是,在经历了理性王国的幻想的破灭、非理性主义的挑战与流行之后,人们正在重新审视理性思维方式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的地位。人们已越来越明白,启蒙运动使理性思维方式成为人们一般的思维方式,其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这乃是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维革命。中国启蒙运动无穷尽的困顿，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为万分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迫，总想从国外现代文明中拿过几样现成的具体成果，在中国立即开花结果，立竿见影，马上见效，而过分忽略了看来形态不那么具体、效果更不那么显著的思维方式自身的变革。

现今，人们所经常关注的理性有所谓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知识理性，艺术理性；技术理性，科学理性；历史理性，群体理性；演绎理性，分析理性；如是等等。理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理性，无疑有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概括说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反省的批判的精神。就是不迷信任何外在的权威、现成的经典、流行的偏见，坚持通过反省与批判，对于既存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以及先前毫未置疑的种种观念信仰，一一重新加以审视、检查、诘难、辩驳、求证，以确定所有这些对象历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它们的真理性、有效性以及发展变化的可能性。

其二，通过理智，锲而不舍地追求真实与发现真理的意志。理性，不是一种容器，仅仅为人们提供一定数量的具体知识、原理或真理，它其实更是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它的使命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追求真实，顽强地冲破一切障碍去发现真理。这种认识能力、认识力量，更敢于承认自己所发现的原理与真理，只是对真实的事实的有限的了解，认识的真理性、有效性同样是相对的，理性的不断前进完全可以在往后摒弃它或更替它。正因为理性是这样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它就不是为一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所垄断专擅，而应当为人们所共同拥有，问题就在于激活它，开发它，使它从不自觉状态进到自觉状态，从局部性思维活动扩展为普遍性公共思维活动。

其三,确立并严格依循一以贯之的分析、分解和结合、构建的认知方法。理性将自己的认知建筑在分析一切事物的现象、表征的基础上。它努力分解人们根据经典、启示、传统、习惯和权威、信仰所获得的一切原理、规则、观念、秩序,对它们进行解剖以及几乎无穷无尽的反复诘难、辩驳、验证、纠错,尽一切可能排除感情、欲望对于理智本身的牵制,以了解事实的真相,然后,再把所获得的事实经过比较、汇总、综合与重新构建,形成对于外部世界全新的认识,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它反对一切以情代理,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分析,在大前提未经验证未获得确认下的演绎与推理,以及由此获得的连锁结论。

这样一种理性的精神,理性的意志,理性的方法,在中国启蒙运动中也曾拥有。在一些启蒙思想家和一些民众中,在一些历史时期和一些特殊的领域,它们甚至还一度占据过主导地位。但是,却无论如何不能说理性已经构成了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已经成了中国启蒙思想家与中国民众一般的普遍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通观中国启蒙运动发展的全过程,不能不痛苦地承认,人们在更多的场合,其实仍在继续使用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包括对于进化论、人权论及社会主义这样一些西方启蒙运动最具体的卓越成果,人们也经常是以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来处置的。

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当是《礼记·中庸》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一思维方式,中心是道德本体主义。“尊德性”成为全部认识活动或思维活动的总前提。在中国古代社会,人的功名成就模式,第一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社会功能模式,第一是正德,其次是利用,第三是厚生;它们都表明,道德取向指导着整个社会的运作。道德标准同样也指导着全部思维活动。康有为在《康子内外篇·仁智篇》中

对于中国传统的以“仁”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与他希望建立的以“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两者之间的歧异，曾有过一段专门的论述。他写道：

物皆有仁、义、礼，非独人也。鸟之反哺，羊之跪乳，仁也。即牛、马之大，未尝噬人，亦仁者。鹿之相呼，蚁之行列，礼也。犬之卫主，义也。惟无智，故安于禽兽耳。人惟有智，能造作饮食、官室、衣服，饰之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皆智来也。……故惟智能生万理。

或谓仁统四端，兼万善。非也。吾昔亦谓仁统义、礼、智、信，与朱子言“义者，仁之断制；礼者，仁之节文；信者，仁之诚实；智者，仁之分别”同。既乃知人道之异于禽兽者，全在智。惟其智者，故能慈爱以为仁，断制以为义，节文以为礼，诚实以为信。^①

康有为这里所说的“仁统四端（即义、礼、智、信——笔者注），兼万善”的思维方式，即中国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维方式；而以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则接近于理性思维方式。“仁统四端，兼万善”，规定了智的追求即对于真实与真理的追求，必须以道德取向为其取舍的最高标准，维护礼义廉耻和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等四维八德是全部认知活动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启蒙运动之所以对理性思维本身没有兴趣，而忙不迭地把进化论、人权论、社会主义这三大具体成果径直输入进来，其实正是基于这种道德本体主义。因为这三大成果，被视为代表了至善、万能，符合人的道德本体及其未来。尽管启蒙思想

^① 《康有为全集》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192页。

家中不少人对传统的道德规范，特别是旧礼教都极为不满，大声疾呼要建立新道德。这三大舶来品，在他们眼中，正代表了全新的道德。在道德本体主义上，他们同传统思维方式其实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

与这种道德本体主义相联系，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尽管也不乏批评、阙疑的精神，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信奉、屈从乃至迷信各种权威、圣贤、经典、传统与习惯的。批评与阙疑，更多的是针对着“异端”，针对着“旁门邪说”。在中国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猛烈抨击了中国传统的权威——孔子、孟子、老子、朱熹，对儒家经典、纲常伦理曾大加挞伐；但是，他们所做的只是以达尔文、卢梭、斯大林取代了孔子、孟子、老子、朱熹，以《天演论》、《民约论》、《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取代了《四书》、《五经》，这就是以对新权威的迷信和盲从取代了对旧权威的迷信与盲从，以新的信仰主义取代了旧的信仰主义。“惟上智下愚不移”的等级性思维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也延续了下来。领袖们、精英们是睿智者、教育者、灌输者，凡夫俗子们是受教育者、被灌输者、服从者、行动者。与此相应，便只承认思想与认知的单一性，不能容忍思想与认知的多元性、丰富性、多样性、多层次性。

在方法论上，传统思维方式也有考订、求证，但是，它主要不是面向实际，不是面向事实本身，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与综合，占支配地位的认识方法，是按照经、传、注、疏的程序进行演绎。经书上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可置疑不可动摇的绝对真理，一切认知结论由以成立的大前提；思想家们只能为经作“传”，后世的思想家们只能为“传”作“注”，为“注”作“疏”；而平民百姓们只能对这些经、传、注、疏认真背诵，悉心揣摩，尽心体会，坚决照办。中国启蒙运动在自己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一次又一次受到严重挫折和失败后，曾不得不面向中国实际，意识到

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传统的经、传、注、疏进行演绎的认知方法,更经常见到的是一个经典不行了,再找一个新的经典;一种注、疏靠不住了,再树建一种新的注、疏;经、传、注、疏这种认知方法仍顽强地延续了下来。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唯上、唯书,不唯实。

在方法论上,传统思维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情理不分,以情代理,放纵情感以取代理智的分析,用主观价值取代客观之理,甚至由此走向唯意志论,走向直觉主义与狭隘经验乃至蒙昧主义的结合。在启蒙运动中,这种情理不分、以情代理、以浪漫主义的幻想取代客观冷静的理智分析的现象同样大量存在。而这一切所带来的,必然是思想和行动的混乱、无原则性及无深度性。

历史发展的严峻形势曾经几度突出了启蒙运动必须重视思维方式革命的问题。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农民战争因“左”倾机会主义所坚持的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肆虐而濒临全局失败之际,毛泽东勇敢地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在清算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清算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中,更明确地将“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但在这之后,由于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特别是在掌握了几乎不受制约的国家最高权力之后,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意志逐渐变得胜于相信事实本身,最终导致将“实事求是”抛到九霄云外。直到70年代末,在整个民族经受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与苦难之后,经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论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才被作为时代最迫切的根本性任务提到整个民族面前。这就是将思维方式的全面革命提到关系整个民族命运的空前高度。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法治化、世界化等等的发展,则为这一思维方式的革命提供了空前强大有力的

社会支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百年来严重缺位的理性思维首次开辟了成为人们一般思维方式的现实途径。这是因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敢于面向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反省的批判的精神和一以贯之的分析综合方法,去发现真实,探求真理,而这正是理性思维的基本要求。思维方式的革命被看得更重于一个个具体文明成果的借鉴与吸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性缺位”的时代已经开始走向终结。

启蒙是一个历史过程。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说过:“我们决不应忘记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和知识的合理化的方案,技术的变化,所有这些是非常难于用一个字来总结的。”^①但是,不管怎样,启蒙总首先是一个思想运动,是思维方式的一场革命。以至于可以这样说,当理性思维一旦真正成为公众普遍的、自由的、公共的思维方式之时,也就是人民不再充当一个盲目的和愚蠢的思想服从者角色,而能运用各人自己的大脑依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认知世界,包括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之时,启蒙运动就可宣布自己已经到达大功告成之日。

①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 1998 年 6 月版,第 435 页。

目 录

序	启蒙:思维方式的革命	1
第一章	启蒙运动和社会转型:同构与异构	1
1.	二元化的社会激荡	3
2.	农民运动与启蒙的拮抗与对流	20
3.	文化结构“一生二,二生三”的转变	34
4.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双向运动	50
5.	理性的错位与缺位	67
	——个案分析之一:孙中山与中国启蒙运动	
6.	理性非理性间的彷徨	85
	——个案分析之二:《新青年》的德赛两先生	
7.	激进与保守:启蒙的估定	98
8.	救亡与启蒙:启蒙的再估定	113
9.	儒学的世纪重构	121
10.	民族精神的世纪疏解	134
第二章	进化和革命: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	161
1.	进化哲学的冲击与中华文化的反应	163
2.	进化论与章太炎文化观的形成	167

第三章 意志与表象 (69)

第一节 表象

——认识论意义上的世界 (70)

第二节 意志

——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 (74)

第三节 理念

——美学意义上的世界 (81)

第四章 日神与酒神 (100)

第一节 悲剧精神

——肯定生命的美学思想 (101)

第二节 超人哲学

——颠覆伦理的价值观念 (114)

第三节 永恒循环

——超越宗教的宇宙信仰 (130)

第五章 压抑与升华 (140)

第一节 本我、自我、超我

——深层心理模式的建立 (144)

第二节 梦魇、过失、疾病

——日常心理现象的剖析 (155)

第三节 宗教、艺术、科学

——文化心理内容的理解 (163)

第六章 绵延与创化 (173)

第一节 时间与空间二元

——直觉认识论 (174)

第二节 生命与物质二元	
——创造进化论·····	(185)
第三节 美感与滑稽二元	
——生命艺术论·····	(191)
第七章 存在与时间·····	(203)
第一节 存在的生成	
——基本本体论·····	(204)
第二节 死亡的召唤	
——原始伦理学·····	(215)
第三节 诗意的栖居	
——艺术哲学·····	(221)
第八章 自在与自为·····	(237)
第一节 虚无	
——主体存在的起点·····	(239)
第二节 他人	
——社会存在的前提·····	(257)
第三节 自由	
——艺术存在的根据·····	(266)
后记·····	(275)
再版后记·····	(281)

第一章 反理性思潮 的三重背景

大约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滋生起一股强劲的反理性思潮，它从哲学领域、艺术领域一直波及到日常生活领域，使传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尺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从时间上看，我们至今仍无法断定这种思潮还要持续多久；从空间上看，它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其发源地的国界线……。这种规模如此之大、历时如此之久的反理性思潮绝不会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只有将这种特定的思潮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才可能看清它的原貌。因此，分析和研究反理性思潮所以得以出现的历史背景，便成为本书研究工作的起点。

为了不使我们的研究陷于庸俗社会学的机械推论，我们必须摆脱传统的线性因果关系式的思维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导致同一结果的不同原因，并将它们放在不同的层次上加以系统的分析。

毫无疑问，用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来看，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导致反理性思潮出现的根本原因、决定

因素。这也就是我们所要考察的第一个层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层次，是原因的原因、背景的背景；忽视或否定这个层次，我们的研究就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但是，这不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层次，而且是离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相距最远的一个层次。因为存在对于意识的影响和制约并不总是直接的，而往往是间接的，是要通过一些中介环节才能够实现的。而作为现代西方的社会生活与反理性思潮之间的中介环节，我们找到了需要考察的第二个层次——西方世界的文化背景。文化是介于存在和意识之间的过渡环节（关于“文化”概念的理解，见本章第二节），它接受经济、政治生活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以其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态，将这种影响和制约传达给更为具体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所要考察的这第二个层次对反理性思潮的影响，较之第一个层次更为直接、更为具体。在区分出上述两个层次之后，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作为社会意识的反理性思潮不仅要接受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且其自身还有着相对独立的思想传统。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 因此，分析西方社会的哲学传统和思想渊源，便是我们要考察的第三个层次。

简而言之，本章试图在三个层次上来考察反理性思潮得以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一个层次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将分析文明与异化的二律背反现象。第二个层次是西方世界的文化背景；在这里，我们将分析基督教文化的崩溃及其影响。第三个层次是西方的哲学传统和思想渊源；在这里，我们将分析哲学本体论的毁灭及再生与反理性思潮之间

^① 《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